



对一项村际传统龙舟赛国家化实践的人类学考察

涂传飞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采用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从人类学视角对一项村际传统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过程进行了深度考察和阐释。研究表明:1)江西省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举办的村际传统龙舟赛时对其形式、内容等进行了国家化的改造;2)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是国家与地方等各方力量互动与共谋的过程;3)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的效果主要有:实施民族国家规训、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等。从而总结出民俗体育文化的一种综合化的传承路径,探讨了民俗体育文化作为治理技术的逻辑理路及其与现代体育、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民族国家是如何被内化、想象和建构等人类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统龙舟赛;国家化;民俗体育文化;传承路径;内化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肇始于政治学等学科研究领域,该分析框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其中,来自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在该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如郭于华(2000)认为,人类学研究要超越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王铭铭(1997, 2000)认为,民族国家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发展旅游等的同时,也往往为民俗传统的再造提供了空间;Siu(1989)认为,地方政府干部的文化及经济策略导致传统文化碎片的再循环、再利用等。这些研究观察的视角大都集中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传统民俗自身运作机制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力量的渗透与互动关系。在体育学界,陆小聪等(2017)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探讨了地方的民俗体育文化(仪式性体育)的历史变迁,如杨海晨等(2017)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为个案,探讨了仪式性体育在宏大社会变迁中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场景;邱海洪等(2019)以湖南郴州汝城香火龙活动为例,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了乡村仪式性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仪式性体育文化存续的影响。此外,国际比赛中,运动员以国家(地区)为蓝本来想象自己的身体,使其身体已经超越了生物机体的范畴

而成为国家(地区)的形象代表。

总体来讲,学界主要是注重历时性的分析,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体育、仪式及民间象征等文化实践中的国家渗透(国家在场),对当下的关注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就体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言,除了主要侧重于宏大的分析以外,对民俗体育文化实践,特别是民俗体育文化实践中主体行为、身体表达与民族国家的关联等方面的微观分析和解读尚待完善,也鲜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民俗体育文化及人类学相关的理论问题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一项原本由当地村民主办的村际传统龙舟赛在当下转为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个案,力图解释地方政府征用该龙舟赛的原因,该龙舟赛被地方政府征用后对其进行国家化改造的方式,在该龙舟赛国家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联的方法等。研究不仅停留于探求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和因果机制,更重要的是尝试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该龙舟赛被地方政府征用后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庆典所达到的效果和象征意义,并就民俗体育文化及人类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收稿日期:2020-09-14; 修订日期:2021-05-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TY023);福建省“闽江学者奖励计划”。

作者简介:涂传飞(1976-),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体育史, E-mail: 396657345@qq.com。

1 研究方法田野工作地介绍

1.1 研究方法

1) 个案研究法。江西省南昌县虎山Y村、QH村、RF村、M村和石里L村这5个兄弟村落有每年端午节期间各村轮流邀请其他4个兄弟村落的龙舟队来本村赛龙舟的民俗,本研究的个案是在Y村举办的这项村际传统龙舟赛,特别是近年地方政府征用在Y村举办的该项龙舟赛事。2) 田野调查法。多次前往上述5个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并前往村委会、乡政府(管理处)、南昌县教育体育局(以下简称“南昌县教体局”)、南昌县委宣传部、南昌县政府等单位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与该龙舟赛相关的资料。3) 参与观察法。2017—2020年实地考察和观看了该龙舟赛,并多次到Y村等村落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4) 深度访谈法。多次访谈了南昌县政府、南昌县委宣传部、南昌县教体局、乡政府(管理处)、村委会及南昌县龙舟协会的相关人员,也随机访谈了一般村民和观众。

1.2 田野工作地概况

1) 地理与行政区划。这5个村现在处于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小蓝经开区”)的中心区域,距离南昌市区约10 min的车程。Y村的村委会在内部又分为7个村民小组。早期这5个村都属富山乡管辖,2013年,Y村等4个村落划归小蓝经开区金湖管理处管辖,M村则归银湖管理处管辖。2) 经济与人口概况。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这5个村的村民一般将其农田租给本村种粮大户种植,村民多以打工等非农收入为主。近来,由于区位优势,这些村经济状况总体较好,如Y村有村办企业,也有大量土地出让或出租。这5个村人口均约为1 000~2 000名的大村落,其中Y村有2 000余名村民,大概有500户家庭。3) 民间信仰与娱乐。这些村落主要有祖先崇拜和神灵信仰,相继重修了祠堂、村庙和族谱。这5个村的村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其中Y村建有农民艺术活动中心和休闲健身广场等较为齐全的健身娱乐设施。4) 社会流动与分层。这5个村村民平时主要在周边打工,通婚地域仍然是局限于周边地域,因而社会流动较小。村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村民阶层;另一类主要由经济能人、社交能人和政治能人等村民组成能人阶层,这5个村的能人阶层基本上是所在村落的文化精英,对本村的赛龙舟等民俗活动较为热衷。

2 该村际传统龙舟赛自发开展阶段概况

从1980年代复兴之初到2013年,该传统龙舟赛由这5个村自发举办,2014年以来南昌县政府开始频繁征用,并且仅征用在Y村举行的该赛事。因此,研究将1980—2013年时间阶段称为该传统龙舟赛自发开展阶段,而2014年以后则称之为国家化实践阶段。

2.1 该村际传统龙舟赛概况

这5个兄弟村落轮流举办的村际传统龙舟赛一般历时10天,从农历四月二十六一直持续到五月初五,其中,四月二十六、五月初一和初五主要是在各自村落举行祭祀仪式。农历四月二十六早上,这5个村落的男性村民在各自村落将龙舟抬下水并安装好龙头和龙尾。下水后要举行庄严的“请神”仪式,村里负责仪式的老人要进行一套“赞龙词”,同时村民们也要在河岸边燃放爆竹、敬香请愿、祭拜“龙神”。在农历五月初五早上,各个村举行“送神”仪式,村里负责仪式的老人也要唱一套“送龙词”,以感谢龙神的庇佑,而后村民各自回家过端午节。在其他7天里这5个村龙舟队轮流到各村集会与自由比赛,一般按照事先约定,其他4个村龙舟队造访另一个村落。期间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接标,即其他4个做客的村落嫁到东道主村的外嫁女要接待娘家的龙舟队。早期外嫁女一般是赠送娘家龙舟队包子、粽子等食物,生活经济状况改善后改为赠送2条香烟,有的也额外赠送2箱饮料。当天中午,东道主村落要款待到访的4个兄弟村落龙舟队共享龙舟宴,其他前来观看的观众则是到该村的亲戚家吃午饭,午饭后这5个村落的队员重新上船举行龙舟赛。这个时期仍属于传统的龙舟竞渡,没有正式规则,比赛具有随机性,没有固定的起点、终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项传统龙舟赛是由村里的宗族组织操办。改革开放以后,这5个村落也各自陆续成立重修家谱委员会(以下简称“谱会”),谱会基本囊括了各个家族的能人代表。所以,自1980年以来该龙舟赛都是由这5个村村干部、谱会领导及龙舟骨干人员组成龙舟会来组织的。每年端午节前夕,村干部和谱会领导都会协商龙舟赛的赛程安排等细节,他们是当地龙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坚定维护者,各村的龙舟会是该传统龙舟赛得以顺利传承的组织保证。这5个村各组建2支龙舟队参加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在该龙舟赛复兴之初,采用的是需要40个队员的大型木制龙舟,21世纪开始普遍采用22人制的标准龙舟。在龙舟赛期间,这5个村落的家庭除了邀请自家姻亲来本村观看龙舟赛以外,也会邀请新型朋友圈,如朋友、同事、同学、同趣群体等来本村观看比赛并设宴精心款待亲友。早期这5个村落的龙舟赛所需经费主要由村民自筹,自21世纪初以来这些村落村集体经济状况改善,赛龙舟经费主要是由村集体支出。

2.2 Y村龙舟队被征召

在这个阶段,这5个村除了每年自发举办村际传统龙舟赛以外,Y村龙舟队也经常被地方政府征召参加竞技龙舟赛事。Y村龙舟队最早被征召参加的是2002年在南昌市象湖举办的南昌市第一届龙舟赛暨华东地区龙舟邀请赛,并获得了200 m直道赛冠军。此后,Y村龙舟队更加频繁地被征调,代表南昌县、南昌市甚至江西省参加国内

各种龙舟赛事并取得了数十项荣誉,如2012年4月,参加了首届江西龙舟大奖赛并获得第二名;2012年6月,参加江西省农民运动会并轻松摘得龙舟项目的冠军。随着竞技水平的提升,Y村龙舟队被南昌市体育局征召参加第一届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在这届赛事上虽然有来自菲律宾、加拿大等竞技龙舟强国的队伍,但是Y村龙舟队顽强拼搏荣获第六名。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该项村际传统龙舟赛竞技体育以外的价值尚待挖掘,因而地方政府仅限于征用Y村龙舟队,而对该村际传统龙舟赛主要是行使审批权力并提供安保服务及一定的业务指导。虽然征用Y村龙舟队时地方政府为队员提供一定的误工补助,但并未投入专门经费用于打造Y村龙舟队和这项村际传统龙舟赛。自2014年起,除了继续征用Y村龙舟队以外,南昌县政府开始征用和主办在Y村举办的该村际传统龙舟赛,这意味着该传统龙舟赛进入国家化实践阶段,实现了其国家化的历程。

3 该村际传统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阶段

3.1 国家化的内涵

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理性化的产物,一方面是权力集装器(安东尼·吉登斯,1998),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渗透到基层社会和边陲地带。项飏(2010)认为,“国家”概念是高度抽象化、总体性的,从官僚体系来看,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现实中,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政府的政策法规等,国家还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徐勇,2020)及可以支配大众社会的话语权(米歇尔·福柯,1997)等抽象化要素。虽然这些并不等同于国家,但是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能直接观察的无非是树木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虚假的;没有“森林”的概念,我们就不能认识树木(项飏,2010)。据此,本研究也认为,国家化是为了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而按地域划分国民,将国民组织到各级政权机关之中,由此形成自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权力体系(任路,2021)。除了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以外,各级地方政府也是代表国家行使地方管理权,因此,本研究将地方政府征用Y村村际传统龙舟赛的行为也视作是国家的行为,而且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和科层制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国家掌握着对被征用后的该项龙舟赛的话语解释权。政府官员受邀前往Y村龙舟赛现场观摩、讲话和颁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是代表地方政府参加该活动;此外,人类学界也有研究将地方官员受邀参加类似活动作为国家化的具体体现,如郭于华(2000)、黄剑波(2005)、吕俊彪(2005)、覃琮(2011)等在研究中都大致按照这个视角来进行阐释。因此,本研究也尝试将地方官

员受邀参加Y村龙舟赛和在开幕式上致辞等作为分析龙舟赛国家化实践的一个维度。

3.2 征用在Y村举行的村际传统龙舟赛的原因

3.2.1 该龙舟赛自身原因

南昌地区龙舟文化底蕴深厚,是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就Y村所在的区域来看,以端午节龙舟文化为纽带,形成了两大兄弟村落联盟,一个是以富山YU村为首,包括TG村和TS村等3个村落组成的兄弟村落联盟;另一个是以Y村为首的5个村落组成的兄弟村落联盟。这两大村落联盟在历史上就有宗族矛盾,但有意思的这两个村落联盟在每年端午节期间都会在联盟内部举行村际龙舟赛,类似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2017)所描述的“夸富宴”和“库拉圈”。以YU村为代表的3个村落组成的兄弟龙舟联盟及以Y村为代表的5个村落组成的兄弟龙舟联盟在每年端午节期间各自举办龙舟赛。经过多年的积累,以Y村为首的这5个村落传统龙舟赛已发展为当地口碑和影响力俱佳的民间龙舟赛事,而且这5个村落自古以来基于先天性的宗亲、姻亲等血缘关系结成了稳固的兄弟村落联盟,因而这5个村的传统龙舟赛氛围也较为和谐。据南昌县教体局局长DHY介绍,南昌县政府并没有采取因噎废食的做法,而是顺应了本县民俗传统并主动征用这5个村的村际传统龙舟赛,以树立一个和谐龙舟赛的典型,倡导和带动其他村落也要和谐、文明、安全地开展民间龙舟赛事。

3.2.2 Y村自身的优势

竞渡地点包括了自然条件和城镇条件两大因素。这两个条件较好的地方比较容易形成较大的竞渡地点,且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张建世,1988)。这5个村落在小蓝经开区的中心区域,其中又以Y村的地理位置最佳。连接南昌市九龙湖和红谷滩新区的西北环高速公路在Y村设有一个进出口,富山乡政府作为乡镇一级行政中心和乡里的集贸市场都在Y村的村口。所以,与其他4个村落相比,在Y村举行的龙舟赛更容易产生影响力和辐射效应。从河道条件来看,虽然这5个村落都有可以开展龙舟竞渡的河道或水面,但Y村的河道更适合开展对赛道长度有要求的竞技龙舟,而且Y村新河贯穿于Y村,比较适合民众在河边观赛,Y村的村委会办公大楼和休闲健身广场也建在河边,便于举行开幕式等活动。从经济实力来看,在这5个村落中Y村的经济实力较强,其村集体年收入近3000万元,2019年被南昌县政府评为“村集体经济20强”。

从文化底蕴来看,在这5个村中Y村历史最悠久,文化底蕴也最深厚,尤其在祖先信仰和宗族文化方面,Y村在这5个村中居于核心和强势地位。在调研中,Y村村民总是自豪地介绍QH村、RF村是其后裔,Y村甚至是南方Y姓的发源地,M村、石里L村也与Y村自古就有相互联

姻的传统。近年,Y村在村落文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大于其他4个村落,如Y村先后获得“农民艺术活动之乡”和“新农村建设文明村”等多项殊荣,与其他4个村落及附近的村落相比,Y村在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这对于其他4个村落和周边村落均能产生一种向心力。从该龙舟赛的组织者来看,其他4个村一般都是村民小组长牵头,而Y村则是村支书牵头,且Y村村支书在该村际传统龙舟赛中处于领导地位。Y村YGQ村支书带领全村人致富,多次受到南昌市政府和南昌县政府的表彰,曾先后获得了“南昌市劳动模范”“南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多年来,YGQ村支书积极配合各级政府的征召,组建本村龙舟队参加国内各种龙舟赛事,因此,南昌县政府征用在Y村举办的这项村际传统龙舟赛持之有故。

3.3 对该赛事的国家化改造和征用

3.3.1 对该赛事国家化改造

3.3.1.1 仪式过程的国家化

这5个村的传统龙舟赛依托于端午节和民间信仰体系开展,具有一整套复杂的仪式。南昌县政府征用在Y村举行的村际传统龙舟赛时,充分保留和尊重这5个村原有的仪式过程,在此基础上也引进了现代体育赛事所通常具备的仪式:开幕仪式和颁奖仪式。如2017年的开幕仪式包括以下流程:1)全体肃立奏唱国歌;2)县领导致辞并宣读江西省龙舟协会的贺信;3)南昌市前来观摩的领导讲话;4)中共南昌县委书记(小蓝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宣布开幕;5)文艺表演环节(南昌县教育体育局,2017)。比赛结束后,前来观摩的领导也要给获得奖牌和表彰的队伍颁奖,一般由主席台就座的领导给获得表彰的龙舟队颁奖(金)。

3.3.1.2 组织机构的国家化

由地方政府主办在Y村举行的这5个村龙舟赛时要求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行政分工明确。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龙舟赛后将其命名为“南昌市龙舟邀请赛暨南昌县龙舟表演赛”,体现了从南昌市到南昌县以至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该赛事的主办单位是南昌县人民政府、小蓝经开区管委会和南昌市体育局;承办单位是南昌县委宣传部、南昌县教体局和南昌县文明办;协办单位是富山乡、小蓝经开区金湖管理处、小蓝经开区银湖管理处和南昌县龙舟协会(2017年以后)。该赛事成立了组委会,由分管副县长担任组委会主任、县里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所在乡、管理处的领导及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组成了赛事组委会。组委会下设了活动安全部、办公室、竞赛部、场地部、后勤接待部、宣传部、医疗救护部、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委员会等机构,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各个机构的职责作了明确的分工,制定了详细的组织工作任务时间表,主要由政府部门来推进,这也体现了该赛事组织

机构的国家化。

3.3.1.3 该龙舟赛的标准化改造

张建世(1988)认为,传统龙舟的活动形式有游乡、集会和比赛等。在地方政府征用之前,这5个村的龙舟民俗基本上就是上述活动形式,大多为即兴、不正规的。地方政府征用Y村的这项村际传统龙舟赛以后,虽然保留了共享龙舟宴、祭祀仪式和“接标”等传统民俗,但是其核心活动龙舟赛则是按照竞技龙舟的标准来组织开展的。如2016年的比赛首先明确了比赛项目是男子22人龙舟500m和800m直道竞速赛,对参赛队伍人员构成作了统一的要求,规定各参赛队需报名参加这两个项目,对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人数、资格等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在竞赛办法上,也明确提出本赛事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龙舟比赛竞赛规则,由组委会统一提供比赛用龙舟及划桨,也对参赛队的服装、队旗等作了标准化的要求,如参赛队服装统一,上衣背后有明显号码,各队自备队旗一面,呈三角形,高1m,底边长2m,旗杆高3m,旗面注明单位或队名等(南昌县教育体育局,2016)。地方政府也投入专项资金改造Y村新河,Y村新河先后被南昌县教体局和江西省体育局认定为龙舟运动训练基地,这也体现了国家及政府部门对Y村龙舟赛场地的认可。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龙舟赛后使其走向标准化,这是在国家许可的标准下完成改造的,也是国家化实践的具体体现。

3.3.1.4 比赛经费的国家化

在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之前,该赛事的经费主要由这5个村的村集体负责支出。据南昌县教体局局长DHY介绍,南昌县政府征用后该龙舟赛的经费开销约为40万元,其中大部分由南昌县政府、南昌市体育局及南昌县教体局等政府部门承担。如2017年该赛事总经费开销约为40万元,其中南昌县政府、南昌市体育局各拨款10万元,南昌县教体局从体育事业经费中拨付10万元,通过市场开发、冠名权等筹措经费10万元,地方政府部门所投入的经费约占整个赛事经费的75%。因此,总体上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后其经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支出,这表明该赛事在经费来源上具有鲜明的国家化色彩。地方政府作为该赛事的主要经费投入主体介入该赛事,也就确立了国家在该赛事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也意味着在该赛事举办过程中国家意志得以顺利贯彻和充分体现。

3.3.1.5 赛事宣传的国家化

每年端午节期间轮流举办龙舟赛已经成为这5个兄弟村落的固定活动,因此,这5个村并未刻意宣传。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举办的该龙舟赛后,大力开展对该赛事的宣传工作。该赛事的组委会明确要求,县委宣传部、县电视台负责邀请、协调、配合新闻媒体做好赛事的宣传工作;负责赛前、赛中、赛后在县内的宣传报道工作。在政

府部门的介入下,各官方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及各个门户网站都积极宣传该龙舟赛。为了扩大该赛事的影响力和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比赛,南昌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教育体育局、南昌市体育局、江西省文旅厅、体育局等部门官方网站均在该赛事举办前后进行了相应的宣传报道。如2017年该龙舟赛举办后,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对其进行了报道,并且新华网江西频道、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网易等媒体也在各自官方网站进行了转载。由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特别是擅长宣传的县委宣传部来宣传该赛事,使得该赛事成为端午节期间南昌地区的一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盛宴。

3.3.1.6 对其精神的国家化阐释

早期这5个村的传统龙舟赛主要是为了加强兄弟村落间的感情交流及祈求风调雨顺、消灾解难,其作为地方性民俗与国家与屈原的含义关联不大。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以后,则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该龙舟赛所蕴含的精神进行阐释和提升。1)将“团结一致、顽强拼搏、激流勇进、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与民族国家关联。南昌县政府通过征用Y村传统龙舟赛,将龙舟精神与南昌县精神(昌南精神)关联。2)南昌县在征用该赛事的过程中还进一步将“团结一致、顽强拼搏、激流勇进、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联结。前来观摩比赛的领导在开幕式致辞中都不约而同对龙舟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进行了阐释,如2017年CX县长在开幕式上指出:“赛龙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体育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进取精神。”3)南昌县政府征用该赛事之后有意识地将其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在开幕式致辞中也反复提到了“屈原”“爱国主义”,希望利用该赛事增强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了配合南昌县政府征用龙舟赛,Y村在赛场边的宣传栏和村里的文化墙上还突出介绍赛龙舟民俗的起源就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一涵义。

3.3.2 继续征用Y村龙舟队

除了南昌县政府征用在Y村举行的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外,各级政府也继续征用Y村龙舟队参加竞技龙舟比赛,并在近几年取得优异成绩(表1)。在江西省体育局、南昌县政府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Y村龙舟队首次参加了2015年7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及9月在云南绥江举行的中国龙舟公开赛,分别获得了第六名和第五名的佳绩。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在第13届全运会上增设龙舟等19个群众体育比赛项目,江西省体育局副局长LXP认为,在全运会赛场上,江西省的集体项目较弱,而Y村龙舟队是唯一一支有夺奖牌实力的队伍。为了在全运会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在江西省体育局、南昌县政府及江西省龙舟协会等相关部门推动下,Y村龙舟队顺利进入

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龙舟赛事,并参加了2017年4月在长沙、5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华龙舟大赛。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Y村龙舟队以较大优势获得了代表江西省参加第13届全运会预选赛的资格。中国龙舟协会还征用Y村龙舟队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8月在泰国举行的第14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在这届赛事上,Y村龙舟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2金、1银,并一举打破男子200m世界纪录。

Y村龙舟队虽然是作为职业队参加中华龙舟大赛和中国龙舟大赛,但是其代表的是南昌县、南昌市和江西省参赛,近几年来Y村龙舟队已经成为江西省竞技体育的一个品牌。中华龙舟大赛和中国龙舟大赛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龙舟协会的管理和指导下举办的,是国家话语体系许可范围内开展的赛事。Y村龙舟队参加赛事时需要到中国龙舟协会报名注册,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监督。Y村龙舟队在代表地方政府参加比赛中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扶持,据DHY局长介绍,每年南昌市政府投入50万元、南昌县政府投入100万元、小蓝经开区投入50万元、金湖管理处投入30万元、南昌县体育局投入30万元用于扶持Y村龙舟队。此外,江西的一家公司冠名赞助了Y村龙舟队参加2018年中华龙舟大赛。总体来看,虽然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和帮助Y村龙舟队寻找赞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找到有意愿赞助Y村龙舟队的企业较为困难,鉴于此,南昌县政府考虑以直接冠名小蓝经开区的方式赞助Y村龙舟队参加中华龙舟大赛。

3.4 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郭于华等(2000)认为,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其实是国家权力、民间文化权威、民众等各方力量互动与共谋的复杂历史过程,这在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过程中也有充分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地方民众和地方文化精英作为地方社会,一方面配合国家征用该龙舟赛,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参与和融入到该国家化实践中(图1)。

3.4.1 国家居于主导地位

在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中,国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一是国家的经济居于基础性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南昌县作为江西省首府首县和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甚至Y村等村落的经济实力均为Y村龙舟赛的国家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整个国家经济、地方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征用这项赛事,显然各方力量都力不从心。二是国家的政治在Y村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居于导向性地位。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起导向性、决定性作用。近年,南昌县政府对民间龙舟采取肯定的态度并主动征用Y村传统龙舟赛,使该龙舟赛成为一个助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地方治理的积极因素。

表1 2018—2019年Y村龙舟队取得的主要成绩

Table 1 The Important Outcomes of Y Village Dragon Boat Team from 2018 to 2019

比赛时间	比赛名称	成绩
2018年6月	首届全国百强县龙舟邀请赛	300 m直道赛、2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8年6月	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州站	职男组100 m、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8年10月	江西省第15届运动会龙舟赛	男子22人龙舟100 m、200 m、500 m第一名 男子12人龙舟100 m、200 m、500 m第一名
2018年11月	中华龙舟大赛云南滇池站	职男组100 m、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8年12月	中华龙舟大赛年度总决赛	职男组100 m、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8年度总冠军
2019年3月	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	职男组100 m、200 m直道赛第一名 职男组500 m直道赛第二名
2019年4月	中华龙舟大赛湖南长沙站	职男组100 m、200 m直道赛第一名 职男组500 m直道赛第二名
2019年5月	中华龙舟大赛江苏盐城站	职男组100 m直道赛第二名、 职男组200 m直道赛第一名、 职男组500 m直道赛第三名
2019年6月	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州站	职男组100 m、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9年8月	第14届世界龙舟锦标赛	男子200 m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男子500 m冠军、男子2 000 m亚军
2019年11月	第一届中华龙舟大奖赛	职男组100 m、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2019年11月	中华龙舟大赛年度总决赛	职男组100 m、200 m直道赛第一名 职男组500 m直道赛第二名、2019年度总冠军
2019年11月	中国龙舟公开赛总决赛	职男组200 m、500 m直道赛第一名 职男组3 000 m直道赛第二名、2019年度总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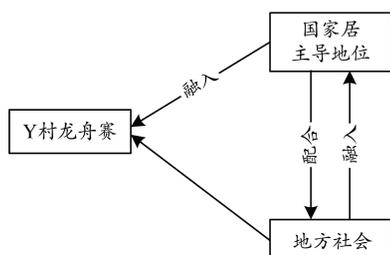


图1 Y村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Loc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Practice

国家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和国家符号的在场。南昌县政府征用Y村龙舟赛后,“国家”前所未有的在该赛事中得到了体现。在村落文化建设方面,Y村赛场边楼房墙面上刷写了诸如“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等10余条新时代新思想的标语。赛场边的休闲健身广场上矗立一块写有“共圆小康幸福梦”标语的大石刻,篮球场边的两个中国结中间写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语。赛场边的宣传栏中写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及“乡村德治树文明新风、龙舟文化展虎山新貌”的话语,同时配有Y村龙舟队近年来获奖的图片和龙舟的起源等介绍。在比赛现场布置上也可以看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各种场景设置。在Y村村口的彩虹门上写有

“热烈欢迎兄弟村龙舟队来我村参加龙舟友谊赛”;在村委会门口的滚动屏幕上播出“热烈欢迎兄弟村龙舟队光临我村参加龙舟友谊赛迎端午佳节”及部分时政的信息。赛场边竖立着多个充气球条幅,条幅上印有“文明虎山人办精彩龙舟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做文明观众,树赛场新风”等国家话语。该赛事的开幕式主要有奏唱国歌、致辞、文艺表演等环节。奏唱国歌的仪式告诉在场观众这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所属于的国家在场,致辞环节传递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文艺表演环节始终保持着欢快、热烈、和谐、教育、规训的氛围,既有广场舞、军鼓队的精彩表演,也燃放大量的焰火。高丙中(2001)认为,有规模地燃放焰火也是模仿国家的庆典仪式。地方政府的官员作为国家的代表观看文艺表演,他们与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形成了规训与被规训(米歇尔·福柯,1998)、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在征用Y村龙舟队时除给予经费资助以外,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常常深入到Y村龙舟队调研,如江西省体育局副局长LXP、南昌市委副书记LGY、中国龙舟协会秘书长YHQ分别调研了Y村龙舟队,并勉励Y村龙舟队:“珍惜荣誉,科学刻苦训练,力争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同时要通过比赛,积极弘扬井冈山精神,讲好江西故事,传播好江西声音。”

3.4.2 地方社会积极配合国家

虽然地方政府征用该赛事过程中国家居于主导地位,

但仍需要地方社会的配合才能完成。近年,这5个村深入推进了城镇化建设,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村民们都发自内心的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征用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Y村的广场舞、军鼓队等各种文艺表演队积极参与到开幕式表演中,其中,广场舞队伍用身体和舞蹈扇摆出“祖国你好”的造型;军鼓队通过着装、道具和表演阵式等多个“统一的”符号,将民族国家的规训和服从意识传递给现场和场外观众,从而达到了传递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效果。由村民组成的参赛运动员也通过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积极配合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在比赛中展现出雄伟强壮的身体,在统一的鼓声和口号下奋力划桨、奋勇争先,在此背景下,参赛运动员的身体是赋予了政治意味的身体,传递了特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力秩序。此外,这5个村村民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在Y村举办的龙舟赛,并热情款待前来观看龙舟赛的亲友,展示本村的新精神风貌。因此,在每年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期间,访谈中的当地村民总是乐此不疲地通过微信、抖音等方式宣传本村龙舟赛,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们对本村龙舟赛被南昌县政府征用后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杜赞奇(1995)在考察华北村落侯家营的关帝信仰之后发现,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乡村领袖力图使自己与儒家文化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劳动大众区别开来。在国家征用该赛事之后,地方文化精英也极力地配合该赛事的国家化实践。在地方政府征用Y村龙舟赛时,由村干部(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各个村龙舟会及谱会领导组成的地方文化精英仍然是各个村落龙舟队的主要牵头人,其通过积极参加和配合该赛事的国家化实践可以建构更多的社会资本,并进一步强化其在村落内外部的政治能人、经济能人和社交能人的优势地位。从村落整体利益来看,这5个村由于同宗同源的先天性血缘关系,已经形成稳固的村落联盟。近年,这些村落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因此,提升本村落的文化软实力对于扩大村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地方文化精英也积极配合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这也是他们对目前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急剧变革的一种回应方式。

3.4.3 地方社会主动融入国家化实践

没有地方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南昌县政府难以征用该村际传统龙舟赛,该赛事也就不可能完成国家化的历程。与此同时,作为地方社会的民众和地方文化精英不仅是单方面地配合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而且有其主观能动性,会主动适应国家征用该龙舟赛的需要,并通过积极融入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而获得自身的发展。近年,Y村等村落在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都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地方民众和文化精英普遍认识到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提升必须要借助好地

方政府征用本村龙舟赛的契机,从而为本村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地方政府征用该龙舟赛并使其进入了国家化历程的同时,来自民间社会的地方民众和文化精英也主动配合,将其作为一种供自身发展的资源而加以利用。

在与地方民众及地方文化精英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法规也较为熟悉并能够灵活运用,如在谈到本村的龙舟赛时,都会主动说出国家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并将本村的龙舟赛与国家制度层面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起来。在国家征用Y村龙舟赛时,地方社会在赛场边张贴体现各种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标语、宣传栏等,这既是为了支持国家政策,也是为了发展当地龙舟赛事。在比赛现场和在与地方民众及文化精英的访谈中,各种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词汇,如“爱国”“文明”“友谊”“和谐”等频繁地被引述。此外,在Y村龙舟赛被征用及国家化实践中,以YGQ村支书等村干部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精英藉由龙舟赛的国家化,接管了部分地方政府让渡的管理权力,如负责组织各村龙舟队参赛,也具有对该龙舟赛的部分解释权和维护权,在这个过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赋予其作为国家在地方代理人的“制度性权力”。

4 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国家化实践的效果

4.1 从村落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换

陈熙远(2008)认为,我国端午龙舟赛助长了地方意识与村落认同,甚至比其他节日、其他民俗活动更能激发地方村落认同。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后,上述认同已经淡化或是居于次要地位,政府对该赛事进行国家化的改造凸显了国家认同,实现了从村落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换。在该传统龙舟赛方面,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后,经过精心策划和巧妙的赛场布置,国家的符号、来自政府官员等的在场、国家话语的在场等,使得国家的形象能够直观、清晰地传递到民众心中。政府关于对龙、龙舟精神、龙舟赛意义的国家化阐释,使该赛事成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下进行的文化实践,当地民众积极配合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凸显了他们心中的国家认同意识。政府征用该赛事,表明国家承认这项地方性的民俗传统文化,地方民众也愿意积极配合甚至主动地接纳国家的符号和话语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认同。龙舟队员在充满民族国家符号的场景下进行比赛,通过整齐划一的锣鼓声、口号声和身体统一的、强有力的划桨动作展示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开幕式上军鼓队和广场舞表演的展示民族国家新形象和新成就的舞蹈,有效地强化了国家认同。在竞技龙舟方面,随着近年来Y村龙舟队的崛起,Y村龙舟队更为频繁地被各级政府征用,每当Y村龙舟队被征调参加各级赛事时,当地民众通过手机、电视观看,或是通过自媒体了解相关赛事的信息,也非常自豪地与亲朋好友分

享其龙舟队参赛成绩等信息,并期待着Y村龙舟队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性比赛,为国争光,正如Y村龙舟队老队长YHB所说:“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村的龙舟队能够走出国门,为祖国获得荣誉。”从地方政府来看,地方政府征用该赛事体现了南昌县政府为推动南昌县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良苦用心,营造了“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良好政治氛围,表达了南昌县政府“奋发向上”“为民请命”的良好形象。政府官员在开幕式上无一例外地反复强调“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客观上达到了民众对政府和国家认同的效果。对地方政府来说,建构国家认同有很多种方式,而通过征用地方传统龙舟赛并进行国家化的改造,让民众充分参与和感受该龙舟赛以强化国家认同,这既简便、安全,效果也较好。

4.2 有效地促进地方社会的治理

传统龙舟赛进一步强化了这5个兄弟村落之间的联盟关系,增进村落内部以及这5个村落之间的团结,即增强“格栅”(Douglas, 1970),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和谐稳定。南昌县通过政府征用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及征召Y村龙舟队,倡导安全、规范和有序地开展民间龙舟赛事,这有助于避免安全隐患,在当地形成了和谐友好的赛龙舟新风尚。在DHY局长看来,从2014年政府征用该村际传统龙舟赛以来,总体上南昌县辖区的端午赛龙舟民俗日益兴盛,而且其中的安全事故也较少发生,整个南昌县端午节期间的民间龙舟赛秩序井然,气氛和谐。

有研究认为,民间仪式被国家或国家部门及其代表所征用,主要取决于其潜在的政治意义,而且政治意义很丰富(高丙中, 2001)。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龙舟赛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首先,该赛事能够营造和谐吉庆的景象,这可以作为当地政府有效地进行地方社会治理,实现地方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的证明,也展示了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成就。其次,地方政府在龙舟赛期间通过各种手段来教育民众与新时代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一致,自觉遵守和贯彻国家法律法规。此外,南昌县龙舟协会是一个半官半民、具有国家色彩的社团组织,其与地方文化精英都积极参与该赛事的组织,并在其中积极贯彻国家意志而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因为其在村落的话语权和威信而容易得到村民们支持。地方政府藉由这些具有双重、多重身份的文化精英顺利征用该龙舟赛,帮助地方政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所以,该传统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治理实践或治理技术。

4.3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南昌县征用该龙舟赛,Y村龙舟队被频繁征用并成绩斐然,促进了龙舟文化在当地的传承。YGQ村支书表示:“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办我们这5个村的传统龙舟赛,也积极响应各级政府的号召组建龙舟队参加各种龙舟赛

事,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和参与到龙舟运动中,特别是近年来在县里主办该龙舟赛后当地龙舟文化进一步复兴,更多的村落搞起了龙舟赛。”就政府层面而言,DHY局长指出,南昌县征用和打造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就是希望在当地树立一个传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榜样。以此项赛事为抓手,南昌县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组织南昌县民俗体育文化的巡游或表演赛,而且县里主要领导基本上都亲临现场、与民同乐。如在2017年举行的“闻鸡起舞、五彩福地幸福年”民俗体育巡游展演活动中,南昌县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本次巡游展演,并就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发表了讲话。

高丙中(2006)认为,如果能够在端午节日文化的烘托下将龙舟发展起来,会反过来带动端午民俗的全面复兴。南昌县政府征用该项龙舟赛后并未改变其在端午节举行的传统,保留了当地与龙舟赛相关的民俗文化,并利用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对该赛事及Y村龙舟队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这也带动了当地民众更加积极地通过微信、抖音、QQ等自媒体及优酷、爱奇艺等线上平台宣传该赛事及Y村龙舟队。这都从客观上吸引了大量民众来Y村观赛,感受端午节的文化氛围,使其成为弘扬端午节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据DHY局长介绍,政府将Y村龙舟赛打造为南昌市龙舟邀请赛和南昌县龙舟表演赛后,该赛事成为南昌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龙舟赛和端午文化盛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4.4 促进当地体育事业发展

地方政府征用这5个村的村际龙舟赛及Y村龙舟队也促进了当地体育事业的发展。在竞技体育层面,Y村竞技龙舟队经过近20年的积淀和发展,从原来的一个村队,逐渐成长为县队、市队、省队,甚至是国家队,在中华龙舟大赛赛场上多次获得多站冠军及年度总冠军,也代表我国在世界龙舟锦标赛取得了骄人战绩。DHY局长认为,Y村龙舟队的强势崛起有力地促进了南昌县、江西省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南昌县教体局也在进一步从Y村龙舟队中总结群众体育带动竞技体育、体教融合、项目交叉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在群众体育方面,南昌县教体局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南昌县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构建包括龙舟健身文化圈在内的5个全民健身圈。以Y村龙舟赛和Y村龙舟队被征用为契机,Y村的体育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兴建了休闲健身广场、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一批健身设施。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群众健身项目的开展,仅在Y村就成立了腰鼓队、模特队、女子军鼓队等多支农民健身队伍。南昌县教体局也以该龙舟赛为样板,把农村体育活动与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每年举办诸如篮球、武术、舞龙舞狮、龙舟、拔河等群众体育比赛和表演活动。在体育社团培育方面,在这5个村各自的龙舟会基础上,南昌县因势利导、鼓励和帮助南昌县热

爱龙舟文化的民众成立了南昌县龙舟协会。南昌县龙舟协会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具有法人代表,协会的制度建设也较为完善。据DHY局长介绍,南昌县龙舟协会不但在南昌县而且在整个江西省都是建设较好的体育社团。南昌县龙舟协会除了协助举办南昌县龙舟表演赛以外,还积极致力于龙舟文化的推广,一是促成了南昌市龙舟协会的成立,二是注重与兄弟县市龙舟协会的交流。因此,南昌县龙舟协会也多次被评为“南昌县体育总会工作先进单位”,其会长YGQ村支书多次被授予“南昌县体育总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4.5 重塑民众的精神面貌

据Y村村民YJH介绍,有些村落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村民在精神文化上缺失严重。当地一直有赛龙舟的文化传统,国家介入这5个村落的传统龙舟赛后,其规模、影响力、精彩程度都有了显著提升,大力推进了地方民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在访谈中,DHY局长也多次强调了龙舟赛对重塑村民精神面貌的积极作用,经过这些年征用Y村龙舟赛和Y村龙舟队代表江西省、南昌县等奔赴全国各地参加龙舟赛,村民们结交了新朋友,收获了新知识,Y村村民的气质也改变了。Y村村民与周边其他村民相比,虽然都是读书较少的农民,但是Y村村民经常参加龙舟赛和观看龙舟赛,其精气神和周边的村民不一样,整个村民的素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比单纯地发钱、建一栋房子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大得多。DHY局长结合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行的扶贫政策,认为扶贫要先扶志,首先要消除精神上的贫困,而Y村将村集体的收入部分用于村落文化建设,特别是精心打造了本村的龙舟文化,这极大地改变了村民们的精神面貌,重塑了村民们的精神面貌。龙舟文化强调奋发向上、同舟共济的品格,这也进一步激发了Y村以及受到龙舟文化感染的村民们为美好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关于龙舟赛对提振和重塑村民精神面貌的作用,YGQ村支书说:“我们村通过打造龙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我们村龙舟反映了我们虎山Y村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我称之为‘虎山精神’。”

4.6 促进当地城镇化建设

21世纪初,南昌市政府为了发展象湖区这个新城区,在象湖连续举办了6届南昌市龙舟赛,有力地推进了南昌市城镇化建设。近年,南昌县城镇化建设目标是在全省率先挺进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率先进入全国县级文明城市行列,率先迈向基本现代化;建设领先领跑的实力昌南、创新创业的活力昌南、宜居宜业的美丽昌南、向上向善的文明昌南、共建共享的幸福昌南。因此,南昌县征用于处于城镇化建设中心区域的这5个村龙舟赛也是力求通过龙舟赛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经过多年的积累,该龙

舟赛也客观上促进了本县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为了进一步助力南昌县参评全国百强县和全国县级文明城市,2018年6月,南昌县政府更是主办了首届全国百强县(市)龙舟邀请赛,Y村龙舟队代表南昌县参赛并获得了200 m、300 m直道竞速两项冠军。

近年,通过积极配合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以及Y村龙舟队频繁被各级政府征用,Y村获得了当地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适当的倾斜和扶持,如2016年南昌县投资200多万元对Y村进行新农村美化绿化、饮用水改造、河道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Y村以龙舟文化为抓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获得“农民文化艺术活动之乡”“小康示范村”“南昌县村集体经济20强村”等多项殊荣。村民们真切地享受到了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福利,所以村民YCF才会由衷地赞叹道:“现在村民们非常满意和高兴,村民的生活跟城里人一样。”在Y村龙舟赛期间,也有大量的城镇居民和周边农民前来观看该龙舟赛事,城乡居民共享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共享龙舟宴。这既可以提升当地农民对城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可以提升城镇居民对农村、农民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更有利于缓解城乡二元对立,促进城镇化建设。

5 基于该个案的理论思考

克利福德·吉尔兹(2000)研究表明,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可藉以将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由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来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所隐翳掉的部分。换言之,对地方性知识的阐释并不妨碍普适性理论的发展,因此,本研究也尝试在个案的基础上对民俗体育文化及人类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5.1 最重要启示:民俗体育文化综合化的传承路径

国内关于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个案类的研究日益增加,但鲜见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建构的成果(涂传飞,2019)。涂传飞(2011)基于若干个案从理论上总结出民俗体育文化有“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保留形式,改变内容和功能”“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等4条可能的传承路径,而本个案可以提炼出民俗体育文化的一条新的传承路径,即“综合化的传承路径”,这是本个案最重要的理论启示。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介入该村际龙舟赛之后,其核心的形式——传统的兄弟村落赛龙舟民俗得到了保留,龙舟赛期间祭神祭祖的仪式也得到了保留;在主要活动内容上,也保留了共享龙舟宴和“接标”民俗等,并增加了一些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现代体育所具有的开幕式等形式和活动内容。地方政府征用该村际龙舟赛时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改造,使该传统龙舟赛承载的主要功能进行了提升和转化,如从社区教育到

民族国家的规训,从村落认同到国家认同及地方社会治理方式的转换等。地方政府除了征用该传统龙舟赛外,还经常性地征召Y村龙舟队参加竞技龙舟赛事,促进了当地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水平提升。这种综合化的传承路径有3个优势:1)开放性和包容性。各种文化形式也可以包容到该综合文化体中,如广场舞表演、其他传统体育文化(如舞龙舞狮助兴开幕式表演)等均可以在这种传承路径中得到传承。2)具有较好示范作用。该个案的启示是民俗体育文化既可坚持传统的发展方式(如延续这5个村的村际传统龙舟赛),也不排斥按照现代体育方式对其进行适当地改造(如政府征用后也采用现代竞技龙舟的竞赛方式)。3)拓展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主体。在该个案中其原有传承主体非但没有流失,并通过该传统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和Y村龙舟队参加国内外各级赛事而使其传承主体不断拓展。在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主体不断流失的大背景下,这种可以拓展传承主体的传承路径对如何找回正在流失的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具有重要启发价值。这种综合化的传承路径也有助于丰富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的理论体系,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当然,在具体的传承实践中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区别对待。

5.2 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一项治理技术的逻辑理路

虽然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廖上兰等,2020;韦晓康等,2016),但本研究认为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本个案来看,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社会治理技术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首先,这是一种多元治理但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模式。俞可平(2015,2021)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最基本标尺便是其能否形成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社区、民众,甚至市场组织都参与治理的多元、共同治理的格局。地方文化精英、一般民众、社团组织、地方政府及官员以Y村龙舟赛国家化为媒介共同参与到地方社会治理中,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体现了一种良好的治理(善治),这种治理意味着尽量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所参与,有所承担,有所收获或者各得其所(郭于华,2000)。更重要的是,从Y村龙舟赛被征用后其经费来源、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及组织者来看,国家在整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这也表明国家在这种多元治理模式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次,这是一种以点带面、样板引领的治理模式。对Y村等5个兄弟村落而言,端午节举办赛龙舟活动是其每年中最重要的民俗。该村际传统龙舟赛既是这5个村落共同体的标志性文化,也是动员村落内外部各方面人员共同参与的民俗文化盛事。地方政府征用在Y村举办的该项传统龙舟赛并将该龙舟赛打造为一个和谐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样板,也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民俗体育文化参与地方治理的典范,这

对其他地方的龙舟赛或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能够起到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民俗体育文化往往是一个村落或若干个村落组成的村落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文化实践,如果其他村落或村落共同体也能够以这种和谐方式为样板传承民俗体育文化,这对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和整个国家的治理都有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再次,这是一种民俗体育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模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所在(托斯丹·邦德·凡勃伦,1964;韦晓康等,2016)。因此,在我国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式制度和现代化的科层制固然重要,但利用民俗体育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来治理国家,达到礼乐教化的效果,也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治理模式。这类于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笔下的巴厘王室庆典等国家仪式:节庆中的展示成为剧场国家存在的核心特征,其中作为中心的剧场国家树立起一种典范,这种典范透露着“国家为何”的根本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因此,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时可以从民俗体育文化中总结治理经验和智慧。

5.3 重新审视与民俗体育文化密切相关的两组术语

本个案有助于重新思考民俗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和现代对立化的类型学划分在许多学科中仍充当着基本的逻辑框架,在我国民俗体育学界,也常认为民俗体育文化总是与现代体育相对立的,并且这是当前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界的主要认识取向。从本个案来看,在Y村举办的这5个村落传统龙舟赛在历史上当然属于民俗体育文化,在地方政府征用之后,虽然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标准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具备了现代体育的许多特征,但该赛事也应仍然属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范畴。该龙舟赛兼具民俗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的形态表明,地方政府和文化主体并没有放弃传统,而是在民俗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用自己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该龙舟赛所具有的新风格、意义和场域。所以,从民俗体育文化到现代体育的过渡是复杂的,绝不是简单的“进化论”式论述所能涵盖的,民俗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孔飞力(2013)指出,所谓的“现代”,指的是“现时的存在”……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即“现代”是具有普世性的概念,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现时的存在”。按照上述对“现代”的界定,可以认为Y村龙舟赛发生的变迁也是其走向现代体育之路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和文化》中提出了被广泛运用于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概念。罗

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认为,“大传统”“小传统”是一组分层概念:一种文化被创造出来了,然后分裂为(甲)上层统治阶级和僧侣阶层的大传统及(乙)世俗人们创造的小传统。按照上述划分,地方性的乡土文化形态应被视作“小传统”,而“大传统”则是指以国家、都市为中心的文化。早期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只是地方性的民俗文化遗产,即“小传统”,近年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地方政府在保留和包容地方性的“小传统”文化(如祭祀仪式、接标和龙舟宴等)的前提下征用这项村际传统龙舟赛后对其进行国家化的改造,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国策及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地方政府的征用使得该龙舟赛成为民族国家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大传统”。从地方政府征用Y村传统龙舟赛并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化的文化实践的个案表明,“大传统”与“小传统”未必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之间界限有时非常模糊,甚至会互相糅合在一起。

5.4 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进一步导致国家的内化

在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能熟练地运用“文明”“和谐”“友谊”“爱国”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话语来讲述地方政府征用该龙舟赛的故事,能够自觉地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化到自己的口头表述中,用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地方政府主办该龙舟赛的开幕式上Y村军鼓队整齐划一的表演,广场舞队伍别出心裁地表演出“祖国你好”的造型,表明村民们已经将“国家”内化为自己的行动。Y村龙舟队代表南昌县、南昌市、江西省甚至是中国参加国内外各级龙舟赛事,这表明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争得荣誉已经内化为Y村龙舟队员的自觉行动。该个案也印证了Siu Helen F.所描述的“国家内卷化”过程:国家的语言被内化为个人自身的语言、身份和自然的意识形态,他们将有关国家的一套语言和意识形态内化,因而每个行动,每个决定,都是在重现国家的在场(程美宝,2016;Siu,2016)。由此发现,平时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郭于华,2000)。地方政府征用该龙舟赛时有意识地植入民族国家符号,地方民众和文化精英也积极配合并主动地接纳民族国家符号,共同构建出“国家的想象”(Abrams,1988),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指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Y村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中的仪式、国家话语和象征符号都是建构对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媒介,这表明我国作

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民俗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仍然离不开对民众共享的民俗文化及象征符号的利用,无论是否在现场、是否相互认识的民众均可以通过该龙舟赛及其呈现的象征符号清晰地将国家内化于心。本个案表明,地方性民俗体育文化可能通过与民族国家联结,使其超越地方性而成为国家化的文化遗产,并成为体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和建构民族国家的一种象征系统和文化符号。

6 结语

Y村龙舟赛由村民主办转为地方政府主办,使得该龙舟赛成一项国家化的文化实践。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也是地方民众、文化精英及地方政府等多方力量对现代化所造成的急剧的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和再表述,是主动地对传统进行新的解释和创新性运用的过程(覃琮,2011)。该龙舟赛国家化实践也是国家(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良性互动的过程,其中,地方社会在积极配合国家的同时也主动融入和参与到国家的发展潮流中,从而有效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地方政府而言,征用该龙舟赛的行为也是一种治理实践和治理技术。各方力量在该龙舟赛的国家化实践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发展,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鲜活景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代表的地方政府征用该村际传统龙舟赛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和“大传统”取向的改造,同时也充分包容和尊重该传统龙舟赛中的“小传统”文化,这也表明从传统体育到现代体育的过渡是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体育也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通过本个案,可以从理论上总结出民俗体育文化的一种“综合化的传承路径”,这对传承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该个案也表明,历经千百年延续至今的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适应环境变化及主动进行自我调适的能力,民俗体育文化可以与民族国家联结并走向国家化历程,也可以与西方体育文化相互糅合,从而实现自身意义的再生产和价值的提升,以拓展其传承的文化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单元,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提出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Y村传统龙舟国家化实践的成功案例充分地表明早期承载着村落(地方)或特定群体认同的民俗体育文化是可以上升为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因此,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除了走项目化的发展路径以外,在促进民族国家认同和整个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大有作为,是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按照这种取向进行意义的调整能有效地把传统的民俗体育文化升华为现代体

育文化,这也应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出路之一。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5-6.
-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2017.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熙远,2008.竞渡中的社会与国家:明清节庆文化中的地域认同、民间动员与官方调控[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3):417-496.
- 程美宝,2016.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读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J].二十一世纪,(12):128-140.
- 杜赞奇,1995.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3.
- 高丙中,2001.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1):42-50.
- 高丙中,2006.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J].江西社会科学,(2):8-12.
- 郭于华,2000.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43.
- 黄剑波,2005.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44(1):187-193.
- 江西省体育局,2017.李小平局长看望参加全运会龙舟预赛的集训运动员[EB/OL].[2017-05-23].<http://www.jxsport.gov.cn/system/2017/05/23/010422616.shtml>.
- 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45-165.
- 克利福德·吉尔兹,2000.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319-320.
- 孔飞力,201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1-2.
- 廖上兰,吴玉华,肖锋,等,2020.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及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40(11):31-41.
- 陆小聪,吴永金,2017.体育与民情: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近代中国体育进程的再思考:兼论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反思[J].体育科学,36(9):3-9.
-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农民社会与文化[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3.
- 吕俊彪,2005.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以海村哈节仪式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5):65-69.
- 米歇尔·福柯,199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

- 海人民出版社:137.
- 米歇尔·福柯,1998.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42-243.
- 南昌县教育体育局,2017.“美丽南昌 幸福家园”2017年“江西银行南昌县支行杯”南昌市龙舟邀请赛暨南昌县第五届龙舟表演赛筹备工作方案[Z].南昌:南昌县教育体育局.
- 南昌县教育体育局,2016.2016年南昌市龙舟赛暨南昌县龙舟表演赛竞赛规程[Z].南昌:南昌县教育体育局.
- 邱海洪,胡建忠,2019.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乡村仪式性体育的变迁:湖南郴州“汝城香火龙”活动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31(5):428-431.
- 任路,2021.国家化、地方性与乡村治理结构内生性演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0(1):24-33.
- 覃琮,2011.标志性文化生产的民族志:以宾阳的舞炮龙为个案[D].上海:上海大学.
- 涂传飞,2011.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33.
- 涂传飞,2019.近10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述评[J].体育科学,39(8):50-60.
-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1964.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39.
- 王铭铭,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
- 王铭铭,2000.灵验的“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C]//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韦晓康,蒋萍,2016.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2(4):31-37.
- 徐勇,2020.国家化、民族性与区域治理:基于历史中国经验的分析框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4):1-8.
- 杨海晨,吴林隐,王斌,2017.走向相互在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J].体育与科学,38(3):84-93.
- 俞可平,2015.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俞可平,2021.探寻中国治理之谜:俞可平教授访谈录[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1):22-29.
- 张建世,1988.中国的龙舟与竞渡[M].北京:华夏出版社:65.
- ABRAMS P, 1988.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J]. J Hist Sociol, 1(1)58-89.
- DOUGLAS M,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IU H F,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U H F, 2016.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Nationalization Practice of a Traditional Inter-Village Dragon Boat Race

TU Chuanf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an inter-village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by the methods of fieldwork, etc.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1) Nanchang County Government, Jiangxi Province

changed its forms and contents when requisitioning thi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held in Y Village; 2)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i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llus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local society; 3)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effects: Implementing nation-state discipline, strengthening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improving local governance, etc.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a comprehensive inheritance path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logic of folk sports as a technology of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modern sports,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and discusses the anthropological issues such as how the nation-state is internalized, constructed and imagined.

Keyword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nationalization; folk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path; internalization*

(上接第28页)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Wushu. Influenced by the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goal of ideal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in traditional Wushu is to be a gentleman. The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d four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haping of the gentleman's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Wushu: 1) "Setting high goals first" to lead the Wushu exercisers to lay a foundation of being a gentleman; 2)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f things thoroughly to promote th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knowledge" of gentlemen; 3) highly advocating the virtue subject to promot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benevolence" of gentlemen; 4)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actice to promot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courage" of gentle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traditional Wushu gentleman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can be detailed as follows: The way of external tempering from "ignorance" to "knowledge"; the way of inner self-cultivation from "learning" to "morality"; the way of uniting inside and outside from "skill" to "Tao".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ideal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mainly as follows: Setting up lofty aspirations with Wushu "ambition" to temper individual will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onstantly striving; cultivating "awe-inspiring righteousness" with Wushu "knowledge" to lead people to seek truth and goodness and develop the right values in life; strengthening moral self-discipline with Wushu "benevolence" to maintain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nhanc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ith Wushu "courage" to promote a high unity between moral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wushu; ideal personality;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